

近代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经济原因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张小溪

摘要:近代外资银行对中国的投资,一直是金融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学术界普遍认为它们之所以能够进入中国市场,是依靠各种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优势,是伴随坚船利炮而来的经济侵略。本文认为,从经济角度来看,现代银行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际投资行为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即使没有当时的战争,外国的银行也无可避免地要进入中国市场。为了更好地找出近代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经济原因,本文基于OLI模型进行研究,从近代外资银行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 and 内部化优势三个层面展开分析,结合大量历史资料,从经济角度解释它们对华投资的根本原因。通过分析,本文发现,近代外资银行选择进入中国市场,一是由于它们具备比中国传统金融机构更雄厚的资金、更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组织结构、更多样化的金融产品等自身优势;二是由于当时中国的特殊区位优势所形成的庞大市场和丰厚利润;三是由于中国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自身缺陷所带来的内部化收益。

关键词:近代 外资银行 对华投资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00(2014)11(c)-091-07

1 引言

近代外国资本在中国的金融活动一直是金融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学界普遍认为,外资银行的这种在华投资行为是伴随着坚船利炮而来的后续经济侵略,它们不过是依靠着各种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特权,才得以进入中国市场。巫云仙研究近代中国外资银行体系后提出:“在英国军事势力向远东扩张,贸易活动跟随着大炮而来的时候,为贸易以及其他投资活动提供服务的金融和商业机构也随之先后在中国的通商口岸设立”^[1]。汪敬虞先生在对德意志银行的在华活动进行研究后指出:“随着法国对中国侵略的加强,法兰西银行的活动,更从贸易领域扩大到财政领域,成为法国财政资本在中国的重要支柱”^[2]。常南在对天津汇丰银行进行研究后指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经济侵略,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开设银行,利用货币资本的特殊机能,通过不平等条约,凭借政治特权,造成业务经营上的优势和垄断,由控制金融市场进而掌握经济命脉”^[3]。余舜丞在《汉口汇丰银行概述》一文中提出:“汇丰利用帝国主义在我国享受特权,进行经济侵略”。深日新在研究外商银行和上海钱庄的关系后指出,外资银行“凭借不平等条约,发行钞票,招揽存款,保存税款等各项吸收中国大量资金,再用以对中国进行剥削和掠夺”^[4]。本文认为,特权优势不是导致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原因,只是为它们进入中国之后的经营带来了便利。从时间上来看,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于1842年4月在广州设立代理机构,而中国近代第一份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于1842年8月29日,并且《南京条约》里没有支持外资银行经营的

条款。也就是说,先有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然后才有特权条约陆续签订。

近年来,有部分研究者开始突破原有研究的局限,他们认为外资银行自身的优势、当时中外贸易的发展以及当时中国金融业的落后是它们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原因。康晶晶在研究晚清时期外国银行对华投资问题时指出,外国在华银行“拥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雄厚的资金实力”,并且“能够认清形势主动调整经营策略,注重加深与东道国政府和官僚的合作”^[5]。张亚兰运用金融结构观和金融功能观对我国近代金融进行分析后发现,当时外资银行的进入只是外国资本商业活动的一部分,银行的功能是“存在社会需求的功能”^[6]。张宏彦对我国近代金融开放的被动性与主动性进行研究后指出,由于当时中国实行金银复合本位制度,导致“中国金融体系中的货币形态是混乱的”,并且铜币被广泛地作为支付手段;“货币制度落后于西方国家”^[7],这些都为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他们的研究突破了以往的研究角度,开始更多地关注经济因素,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只从一个角度出发,没有全面客观地分析近代外资银行的在华投资问题,对该问题的多角度和深层次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与上述的研究不同,本文在研究近代外资银行的对华投资行为时,试图更多地从经济角度出发,运用经济理论进行综合分析。众多的国际投资理论中,邓宁(Dunning)的OLI模型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之一,众多学者用该模型来解释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外资银行的对华投资本质上是一种国

际投资行为,因此,可以基于OLI模型来进行分析。根据OLI模型,如果一个企业要进入外国市场,必须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 and 内部化优势,三者缺一不可,否则对外投资行为就不会发生。所有权优势,是指企业自身所具备的优势,比如企业的规模优势^[8]、先进的生产技术、独特的组织架构、商标、专利和融资能力等;区位优势,是指被投资国所独具的优势,比如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市场规模、贸易壁垒和政府政策等;内部化优势,是指被投资国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这时企业在该国投资建厂所获得的收益不仅大于其投资成本,而且大于其通过交易转移给当地企业所获得的利润。通过对近代外资银行与当时中国传统金融机构(钱庄、票号和当铺)的对比,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本文认为外资银行是在具备了三大优势之后,才选择进入中国市场的,虽然当时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外资银行的对华投资进程,但是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们自身具备对外投资的实力和当时中国特殊的时代历史背景。

2 近代最早进入中国的五大外资银行简介

从1845年到1858年短短的13年间,东方银行、汇隆银行、麦加利银行、呵加刺银行和有利银行这五大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在中国设立了13家分支机构,遍布当时中国大部分的通商口岸。除呵加刺银行之外,其余4家银行的中国分支机构都几乎与其总行同时成立。中国市场成为当时外国银行的目标投资地,所有一切相关的银行都希望将中国包括在它们的活动范围以内。

2.1 东方银行

英资东方银行原名印度银行,于1842年成立于孟买,同年4月在广州设立代理机构。1845年,其更名为东方银行,总行由孟买迁往伦敦。1847年,东方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1851年,东方银行获得英国政府的特许状,更名为东方银行公司,银行额定资本金为200万英镑,实收60万英镑。东方银行公司发展迅猛,五年之内实收资本就从最初的60万英镑增加到126万英镑;有一个时期,东方银行在远东,差不多像英兰银行在英国的地位^[9]。

2.2 汇隆银行

英资汇隆银行于1851年成立,同年,其广州分行成立,和东方银行一样,其总行最初设立在孟买,后搬迁到伦敦。1855年,汇隆银行上海代理处成立,1861年夏天进入香港、汉口和福州开展银行业务。“这是在汉口、福州两地出现的第一家汇

兑银行”^[10]。1865年,汇隆银行的额定资本为200万英镑,实收资本为100万英镑。

2.3 麦加利银行

英商麦加利银行始建于1853年,其总部设立在伦敦,在中国设有上海、北京、汉口、天津和佛州五大分行,此外,还设有厦门、芝罘、汕头、威海卫和胶州五大代理处。麦加利银行的资本金是1200万英镑,准备金是120万英镑。其发起的目的是“银行的正当业务以适应澳洲殖民地、英属印度、中国和希腊与小亚细亚以东其他地区之间日益扩大的贸易需要”^[11]。由于麦加利银行的优秀业绩,1864年,其股息高达12.5%,面值20英镑的股票在伦敦的市价上升到46英镑5先令。

2.4 呵加刺银行

呵加刺银行是英国和印度的合资银行,始建于1833年,总行最早设立在印加孟加拉,后来迁到伦敦,成立时额定资本200万英镑,实收100万英镑。1854年,呵加刺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1855年,其广州代理处成立;1858年,其香港分行建立。

2.5 有利银行

有利银行是印度、伦敦、中国商业银行和亚细亚特许银行的合并,这两家银行都成立于1853年。1854年和1855年,印度、伦敦、中国商业银行在上海和广州分部设立了代理处;1857年,合并后的有利银行在香港设立分行;1860年,有利银行的上海代理处改为上海分行。截至1860年,有利银行的实收资本为75万英镑。

3 外资银行的所有权优势

所有权优势是外资银行与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竞争的根本,因为本土金融机构具有成本低、拥有固定客户、熟悉政策法规等当地优势,根据对外投资理论,只有当所有权优势可以对抗当地优势时,外资银行才具备对外投资的可能。

3.1 资本和资金运营的优势

资本,尤其是实缴资本,是银行经营实力的一个重要体现。当时中国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钱庄、票号和当铺,但是它们的资本实力根本无法与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银行相提并论。以钱庄为例,当时大多数钱庄的本金为两三万两甚至不足万两白银,超过十万两的就可以算得上是资金实力非常雄厚的大钱庄。表1列举了1845年到1899年间主要外资银行的基本情况,从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实缴资本最少的中华会理银行也有10万英镑,其资金实力雄厚,远非一般钱庄可以比拟。与外资银行相比,即使资本实力大致相同,中国

的银行也存在资金运营效率方面的不足。以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为例,它的资本规模与外资银行不相上下,其额定资本和实缴资本达到100万两白银,但是在资金运营能力方面,二者却显示出巨大差异。如表2所示,无论是存款、应付汇票、放款,还是应收汇票与资本的比例,汇丰银行都远远高于中国通商银行,汇丰的各项比例比通商高出5~25倍,这说明汇丰银行运用同样的资本可以进行更多的业务,资本运营效率明显要优于中国通商银行。汇丰银行并不是特殊个例,当时外国银行的资金周转率之高,呆账率之低,往往是当时的华商银行所不可企及的。“他们的资本,相对于存款、股息以及整个交易来说,几乎是微不足道的”^[12],高效的资本运营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利润,从而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表1 1845年至1899年外资银行基本情况

银行名称	总行所在地	资本		总行成立时间	进入中国时间	分支机构数目	改组年份	停闭年份
		额定	实缴					
东方银行	伦敦	200万英镑	60万英镑	1845	1845	6	1884	
新东方银行	伦敦	200万英镑	50万英镑	1884	1884	8		1982
汇隆银行	伦敦	200万英镑	100万英镑	1851	1851	5		1866
呵加刺银行	伦敦	200万英镑	100万英镑	1833	1854	3	1864	
呵加刺银行	伦敦	300万英镑	150万英镑	1864	1864	3	1866	
呵加刺银行	伦敦		100万英镑	1867	1867	7		1900
有利银行	孟买			1853	1854	3	1857	
有利银行	伦敦	75万英镑		1857	1857	8	1892	
有利银行	伦敦	150万英镑	56.25万英镑	1892	1892	8		1984
麦加利银行	伦敦	64.4万英镑	32.2万英镑	1853	1858	6		
法兰西银行	巴黎			1848	1860	7	1889	
法兰西银行	巴黎		160万英镑	1889	1889	7		1894
东方汇理银行	巴黎	800万法郎	200万法郎					
汇川银行	孟买	50万英镑	50万英镑	1861	1861	3		1866
利华银行	伦敦	200万英镑	42.5万英镑	1863	1864	2		1866
丽升银行	孟买	100万英镑		1864	1864	2		1866
利生银行	伦敦	200万英镑	17.5万英镑	1862	1864	6		1866
汇丰银行	香港	500万元	250万元	1865	1865	14		
工部局储蓄银行	上海			1866	1866			1867
德意志银行	柏林	1000万泰来尔	1000万泰来尔	1870	1872	1		1875
德华银行	上海	500万两	125万两	1890	1890	4		1917

德丰银行	伦敦	200万英镑	46.7万英镑	1863	1875	5		1883
上海兑换所	上海			1878	1878			
大东惠通公司	伦敦	100万英镑	12.5万英镑	1890	1890	5	1891	
大东惠通公司	伦敦	200万英镑	25万英镑	1891	1891	5	1894	
大东惠通公司	伦敦	180万英镑	25万英镑	1894	1894	5		1902
中华汇理银行	香港	100万英镑	10万英镑	1891	1891	3		1911
正金银行	横滨	300万日元	300万日元	1880	1893	4		
华俄道胜银行	彼得堡	600万卢布	600万卢布	1895	1896	9		1926

资料来源:汪敬虞《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附页。

注:(1)本表标注的是1845年之后的总行所在地,东方银行1845年之前其总行所在地为孟买,汇隆银行、呵加刺银行、利华银行和德丰银行的总行也是先在印度后搬迁到伦敦,本表中一律标为伦敦。

(2)额定资本和实缴资本均为当年数额,少数银行缺乏相关数据故空白。

表2 1898年中国通商银行与汇丰银行资本运营能力对比

银行名	存款与发钞 / 资本	应付汇票 / 资本	放款 / 资本	应收汇票 / 资本	总资产 / 资本
中国通商	1.18	0.07	1.58	0.5	2.33
汇丰	18.37	1.73	8.76	7.63	22.19
汇丰 / 中国通商	15.57	24.71	5.54	15.26	9.52

资料来源:North China Herald, 1899年5月29日,第969页;F. H. H. King: The History of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Vol. 1, 1987年版,第478页。

3.2 专业技能的优势

西方现代金融制度的建立是一场“金融革命”^[13],反观中国,近代中国金融市场与世界金融市场严重脱节,正规的贴现市场、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都不存在。这种金融市场的缺失状态,导致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缺乏相关的专业技能。以票号为例,票号以放款为主要经营项目,贴现、兑换、金银买卖和票据交换等金融服务均不涉及,经营业务单一。即使是放款,票号也仅仅服务于钱庄、官吏以及大商家,服务对象范围比外资银行小很多。“票号、当铺和钱庄发展的非现代化,使其难以适应当时比较复杂的国际和国内金融通要求,对外经济往

来需要的是现代化的融资模式,这是它们自身难以解决的矛盾。”^[14]与中国传统金融相比,外资银行具有国际金融市场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管理体系,面对未经开发的中国市场,它们谨慎地向广大中国商人提供票据贴现和抵押放款等业务。以汇隆银行为例,其在进行票据贴现时,规定至少要两个担保人;进行抵押放款时,要求抵押品必须放到汇隆银行的仓库,并且还需要检查员或者掮客对抵押品的质量和价值出具证明书。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钱庄、票号和当铺等,虽然开设有抵押放款业务,但是大都具有高利贷性质,无论放款规模,还是抵押管理方式,都与现代银行存在根本的差别。由于专业上的差距,政府借款业务也逐渐被外资银行把持,19世纪60年代以后,外资银行开始和清政府在政府借款和其他金融周转方面进行业务往来,外资银行在借款方面彻底取代了中国传统金融机构。

国际汇兑业务方面,外资银行的专业优势也很明显。在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以前,外国商人都是通过与中钱庄有往来的洋行买办办理一场金融业务。洋行在处理其外国汇票时,常常把他们积有一定数量的汇票刊登广告求售”^[15]。外资银行处理起国际汇兑业务来只需要把自己在国外的网点进行汇票交换即可,省却了许多中间环节。并且,由于它们的现代化经营方式和通讯方式,外资银行处理汇兑业务的汇点和速度都优于中国的传统金融机构,也胜过早先的洋行,这也是它们进入中国后能成功从洋行手中抢走国际汇兑业务的关键优势所在。

3.3 外国政府的支持

外国政府的支持,使外资银行具有“特殊”的优势。这种支持,主要体现在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方面。不论是德资、法资、日资,还是俄资银行,都带有深深的政府印记,只要一有需要,政府就会站出来,并且鼓励它分享中国金融利益方面所作的坚定而富有成效的努力”^[16]。很多外资银行,本身就是为了支持政府的海外金融活动而建立的。例如最早进入中国的法兰西银行,就是为了缓解法国国内经济危机而建立的,专门从事贴现业务的银行。法国政府对其在国外进行的金融活动,一直给予“官方的支持”^[17]。后来进入中国市场的东方汇理银行,也是出于服务法国商人,为他们提供在东方殖民地地区的金融服务而建立的。德华银行的政府背景更加浓厚,其经营目标主要是替德国政府为中国政府提供贷款,“从这些合同中赚钱”^[18]。日本的正金银行是一个典型的“官方对外贸易银行”^[19],其资本金有三分之一来自日本政府,不仅在外汇市

场上享有特殊地位,而且全权办理日本政府的外债和对外支付业务。俄国的道胜银行也是“俄国政府之最方便的工具”^[20],是“俄国财政部一个略为伪装的分支机关”^[21]。与外资银行相比,中国的传统金融机构不仅得不到本国政府的支持,而且经常成为政府盘剥的对象,这使得它们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3.4 组织结构的优势

外资银行采用的是现代股份制结构,股东按照出资额占有相应的股份,属于股份有限公司。基本的组织结构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经理人和监察人。股东大会每年年底召开,董事从股东中选取,经理人负责管理日常事务,监察人由股东选举但不能是股东。经理人在作出有关公司发展等重要决策时需要提请董事会决议,特别重大的事项甚至需要召开股东大会进行表决。当时中国的金融机构大多采用独资或合资的无限责任制,既有出资的股东,又有出力的“身股东”。与股份制相比,这种组织形式的股东人数极其有限,不利于资本的筹集以及社会信誉的形成,阻碍着经营扩张;此外,股东对金融机构的经营影响很大,股东个人财产的损失会引发其入股金融机构的信誉,甚至造成入股金融机构的倒闭,并且,由于股东可以自由退股,金融机构按年分发红利,很难制定长期的经营战略,所以当时中国的金融机构放贷一般以短期借贷为主。经理专权也是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的一大弊端,以票号为例,一般实行总经理(也称大掌柜或者执事)独裁制,总经理一人决定职务的分配、伙计的进退、营业的伸缩等日常经营活动,经理个人的决策失败、投机行为和私自挪用资金常常连累票号倒闭。此外,票号还有一些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特殊规定,如分号的员工不能随便回家,除非是父母去世这种大事;也不能随便往家里寄钱;不可以带家眷;不可以在外地娶妻纳妾等。外资银行的现代组织结构显然比封建组织结构更适应时代的发展,更加人性化和合理化。

3.5 产品多样化的优势

钱庄、票号和当铺是近代中国金融业的主要机构,但是它们的经营范围远远不能和现代化的外资银行相比。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之前,钱庄部分地为来华商人提供货币兑换服务,同时也在国内市场开展存款、放款、签发庄票和票据贴现等业务;票号则以经营国内汇兑为主营业务,存、放款为辅助业务;当铺则涉及存、贷款和部分货币兑换业务,也有个别实力雄厚的当铺发行银票和钱票。外资银行提供存款、发钞、票据贴现、抵押放款、买卖和经纪汇票等业务,产品更加多样

化。尤其是在吸收活期存款方面,外资银行向储户提供利息,彻底改变了传统金融机构‘不付息反抽手续费’的做法。

4 中国的特殊区位优势

区位优势是决定资金投向的关键。根据OLI模型,当企业具备所有权优势时,它只是拥有对外投资的可能,至于投资到哪里,则由被投资国的区位优势来决定。当时,中国潜在的市场前景以及自身金融制度缺陷所带来的汇兑利润为外资银行的进入提供了有利的区位因素。

4.1 对外贸易的需要

最初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银行多数为英资银行,这与当时英国的国情有很大关系。19世纪40年代,英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生产体系的建立使英国的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其工业品成本低、标准化程度高。但是,英国国土面积不大,资源有限,其国内需求也有限,因此,寻找新的海外原材料供应市场和工业制成品市场就成为当时英国的头等大事。中国是英国传统的主要贸易国之一,“1834年3月22日,第一艘英国‘自由船’载着‘自由茶’离开广州”。当时,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主要出口茶、丝、豆等农产品和瓷器,进口鸦片和棉花及少量工具(详见表3和表4),进出口贸易需要进行货币兑换,同时商人们有巨大的融资需求,这是银行出现的客观原因。图1显示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情况,除了少数时期有短暂的下滑之外,总体来看贸易额是不断上升的。银行通常紧随贸易,经营贸易的商人不可能自己带着黄金白银往返收付货款,他们庞大的金融需求使外资银行看到了中国市场的潜力和从中获取利润的机会,当时银行的主营业务是国际汇兑和国际结算,其利润的源头便是国际贸易,所以英资银行最先具备开发中国市场的动力。随着中国与其他国家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众多外资银行尾随英资银行逐渐进入中国市场。

表3 清政府进口商品构成 单位:%

年份	合计	消费品原料	直接消费资料	机器及大工具	原料
1893	92.2	13.0	78.6	0.6	-
1903	85.7	22.3	62.7	0.7	-
1910	84.0	17.0	65.4	1.5	0.1

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 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72~72页。

表4 清政府出口商品构成 单位:%

年份	合计	农、矿产品	半制品	制成品
1893	100	15.6	28.5	55.9
1903	100	27.2	31.9	40.9
1910	100	39.8	25.0	35.1

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 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72~7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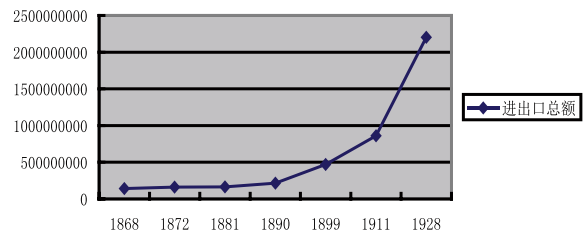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对外进出口总额

资料来源:巫云仙《汇丰银行与中国金融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8页。

4.2 资金市场的需求

中国市场对于资金的需求,也是促使外资银行进入的重要原因之一。近代,清政府中的洋务派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大举兴办新式企业,这些新式企业与中国传统的作坊经营不同,它们大都需要巨额启动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已经不能适应它们的融资要求,客观上需要现代银行来充当金融通的中介。此外,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的困境,也需要大额的资金借贷来维持,外资银行的出现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表5展示了汇丰银行从中国政府直接贷款的收益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政府贷款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之一,最多的时候甚至超过了其利润总额的百分之五十,这也从另外一个层面反映了当时中国政府对于资金的强烈需求。同时,传统金融机构在面临资金短缺时也需要进行同业拆借来渡过危机。并且,普通百姓也希望在高利贷之外能够找的一种新的借款方式。在中国,没有像英国、法国和德国那样的国家银行。在银根紧的时候,钱庄和私人,可以对之进行借款。在通商口岸,解救的办法是向外国汇兑银行的分支机构借款。这对中国钱业和中国贸易都有很大的裨益。

由此可见,当时外资银行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各阶层对资金的需求。

表5 1876~1888年汇丰银行从中国政府直接贷款的收益情况

单位:1000港元,%

时间	总收益	直接贷款收益	占总收益比重
1876	479	40	8.4
1877	565	284	50.3
1878	340	72	21.2
1879	335	50	14.9
1880	523	140	26.8
1881	715	300	42.0
1882	817	129	15.8
1883	739	80	10.8
1884	701	186	26.5
1885	948	61	6.4
1886	770	384	50
1887	599	134	22.4
1888	864	256	29.6

资料来源 Frank H. H. King, *The Hongkong Bank in the Late Imperial China, 1864-1902: On An Even Keel, 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Vol. 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第283和309页。

4.3 巨大的汇兑利润

当时中国特殊税收制度和银铜复本位给国内外汇兑业务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这种利润的存在吸引了外资银行的目光。清朝实行的税收制度与西方大多数国家都不同,当时西方国家实行的是公库制度,也就是说一切国家收入需要上缴国库,而清朝则不同,因为一切收入理论上都是属于皇帝的。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税收不是被直接送入北京,而是经常因为某些特殊用途被转拨。例如,某省税收的年征收额假定是五十万两,这税款并不解缴帝国国库,或者等候帝国国库的支付命令,而是直接以十万两汇解上海道作为归还外债费用,以五万两汇解上海道作为驻外使馆的经费,以二十万两汇解河南作为黄河防洪费用,以五万两留作整修该省海防设备的费用,以五万两上缴北京作为皇室费用,并且以五万两指定为皇陵修缮费用。“这种协饷可能是从甲省拨解乙省,乙省再转拨丙省,丙省又拨解甲省,但各省在拨解的时候,所拨款项都是足额拨解,从不试行互相冲抵只收解差额的办法。清朝的银两兑换也存在很多问题。清朝实行的是银铜复本位而不是

国际通用的金银复本位,因为当时中国只有铜钱而没有铸币。更为糟糕的是,中国白银货币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全国不下有几百种标准,就在一个地方也会有十几种标准,彼此相差数额可以达到百分之十以上。甚至库平银,也仅在帝国国库方面使用,它在国内其他各地只是一种会计上的货币。正因为存在不同的兑换标准,各地政府才愿意不辞辛苦地将税银全额拨解其他地方,通过兑换率的差额以此来获取好处。外资银行当然也垂涎这种国内汇兑利润,这也是它们选择进军中国市场的部分原因。

但是,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初期,清政府的汇兑业务大都交由山西票号来代办,它们并没有从国内汇兑业务中得到很大收益,它们的利润主要来自国际汇兑业务也就是由中国贸易产生的很赚钱的汇兑交易的最大部分。当时中国商人偏爱一些外国货币,中国人对于某几种银元定了高于它们实在价值的价钱,比如墨西哥银元就曾经在广州大受追捧。但是它们在别的地方价钱是一样的,中间的汇兑差额就成为外资银行的利润来源。并且,随着中外贸易的不断扩大,不论外国商人还是中国商人,都需要将售货所得的外币兑换为本币,中间产生的汇兑利润也是外资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之一。

5 外资银行的内部化优势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之前,东印度公司和外国在华洋行代替银行经营着一部分中国对外贸易的金融业务。根据OLI模型,如果当时的外资银行只是具备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它们应该选择投资东印度公司和洋行或者是中国本土的金融机构,而不是到中国进行直接投资。邓宁在生产折衷理论中指出,内部化的根源是市场失灵,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使得直接投资(即内部化)能够获得大于间接投资的收益,并且投资成本很小。当时,中国金融市场不仅没有设立中央银行作为监管机构,而且缺乏适应国际新形势的金融体系和货币制度,存在严重的市场失灵问题,这就为外资银行提供了获取内部化优势的机会。

5.1 监管机构的缺失

当时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陆续成立了中央银行充当金融监管机构,执行监管其他商业银行运作、发行货币和进行银行间清算的职能。但是,由于中国金融发展的滞后性,清政府直到1905年才成立了户部银行,行使部分中央银行的职能。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实际上长期处于一种混乱、无人

监管的状态。在这种职能部门缺失的情况下,外资银行的进入变得极其简单,它们在中国建立分支机构不需要中国政府的审批,经营范围和经营模式也不受任何限制,进入中国市场的投资成本微乎其微,收益却很大,在内部化收益的刺激下,外资银行当然会选择进入中国市场。

5.2 货币制度的落后

19世纪后期,因为银价的不稳定以及黄金开采量的增加,大部分国家逐渐放弃银本位而开始实行金本位制度。如前文所述,中国当时实行的是银铜混合本位,经济落后才实行银本位制,也因为落后经济不能不转入国际商品经济旋涡,不能不引起新经济关系的冲突,致不克形成一个有系统的银本位制。此外,由于清政府下放造币权,各地政府和金融机构随意发行廉价铜币作为敛财的工具。并且,政府常常发行没有任何贵金属为基准的纸币,导致当时纸币在中国的认可度不高,人们更倾向于使用银、铜作为支付手段。这为外资银行推行以银元为单位的银行券以及依靠其信用发行的纸币提供了机会,它们迅速取代了银两和廉价辅币,从商人开始,逐渐在普通民众中流行。从某种程度上看,外资银行的进入适应了当时中国币制改革的需求,对纸币的流通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6 结语

对于近代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原因,本文认为不仅仅有其政治因素,更深层的原因是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资本都是逐利的,外资银行对中国的投资,不是偶然的冲动,而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通过运用对外投资经典理论对近代外资银行的对华投资行为进行分析,本文发现,首先,当时的外资银行自身具备了所有权优势,它们无论是资本实力,还是资金运行效率和组织结构,都比钱庄、票号和当铺等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更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其次,近代中国的特殊区位优势——庞大的金融市场需求和丰厚的货币兑换利润空间,都成为吸引外资银行进入的原因;最后,由于中国近代金融市场自身的不完善,为外资银行实现其内部化优势提供了契机,所以外资银行选择直接进入中国市场而不是入股中国传统金融机构。

参考文献

- [1] 巫云仙.汇丰银行与中国金融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 [2] 汪敬虞.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M].北京:人

- 民出版社,1999.
- [3] 寿充一,寿乐英.外商银行在中国[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
- [4] 康晶晶.外国银行在华投资问题研究——以晚清时期为中心[D].河北经贸大学,2012.
- [5] 张亚兰.从近代金融史看金融发展[J].中国金融,2012(18).
- [6] 张彦宏.中国近代金融开放的被动性与主动性探析[J].当代经济,2009(4).
- [7] North China Herald,1892-6-10.PP772-773; North China Herald,1894-1-19.
- [8] Mackenzie. Realms of Silver [M].Routledge pressed.
- [9] F.H.H.King.The History of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M].1987(1).
- [10] 高德步,王钰.世界经济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 [11] 巫云仙.汇丰银行与中国金融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 [12] H.Feis. Europe:The World's Banker 1870-1914[M].1930.
- [13] E. Kauffman. La Banque en France[M]. 1914.
- [14] G.C.Allen. Western Enterprise in Far Ea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China and Japan [M].1954.
- [15] 民歌译.帝俄侵略满洲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 [16] B.Rosen.Forty Years of Diplomacy[M].1922(1).
- [17]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M].北京:三联书店,1957.
- [18] Daily News,1887.
- [19] M. Collis.Way Foong[M].1979.
- [20] 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 [21] 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